

## 引 言

这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半岛。这是一块改革开放的热土。岁岁年年，滚滚长江在这里挥洒着壮阔的情怀；日日夜夜，滔滔嘉陵在这里鼓荡着明快的旋律；巍巍群山在这里倾吐着巴渝文化的芬芳。这座雄踞于两江之上的山城，就是我们共同拥有，深深眷恋的重庆。

它像一首战斗的诗篇，鼓动人们为之吟诵；它像一幅优美的图画，让人们为之流连忘返。朋友，让我们敞开心扉，用真诚和热情，去凝视它那美丽的容貌，去聆听它那深沉的倾诉吧……

## 一 古代巴渝

### 1. 两江合抱的山城

重庆，这座名闻遐迩的历史名城，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地当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口，是长江上游的水运枢纽。重庆，古称“江州”，“州”指水中之高地，“江州”，意为江中小岛。因重庆地处两江交汇之处，三面环水，一面虽不近水，却犹如鹅项，故而得名。今天又把它称做“山城”，因它地势险要，多丘陵、低山，而少平坝，其整个地势大致由南北向两江河谷倾斜。登高极目，但见长江南岸群山巍峨，嘉陵江北缓丘迤邐，两江滔滔流水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合抱着山城重庆，景色蔚为壮观。

重庆，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不仅控川西、川东、川北、川南的

冲途，而且扼云、贵、康、藏的门户，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西南的军事重镇。

早在跨入文明时代之初，生息在重庆地区的最早先民——巴人就在江州（今重庆市）建立了国都。公元前 316 年，秦国大将张仪、司马错率兵入川，攻灭巴国，在重庆地区设巴郡，郡治设在江州。两年之后，出于防卫的需要，张仪在江州筑城，重庆成为秦王朝统治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至此，重庆开始成为一座有城垣的封建军事堡垒。三国时期，群雄逐鹿，汉室宗亲刘备割据四川，偏安一隅，重庆的地位日益突出。都护李严率重兵驻扎江州，大兴土木，筑大城，方圆达 16 里。隋朝统一后，实行州县两级制，因嘉陵江古称渝水，所以把重庆称做“渝州”，这就是今天重庆的简称“渝”的由来。北宋徽宗年间，重庆又改称“恭州”。不久，金兵南侵，北宋覆亡，宋高宗赵构逃到临安（今杭州市）称帝，史称“南宋”。南宋的第二个皇帝是宋孝宗，他的第三个儿子赵惇被封为恭王，藩封恭州。后来，赵惇当了皇帝，按照宋王朝潜藩升府的惯例，于 1189 年 9 月 18 日升恭州为重庆府。此后，重庆地区的辖境虽时有伸缩，但地名再无更改，至今已 800 余年。南宋末年，宋蒙对峙，四川

战事吃紧，重庆一度成为四川省军政中心，著名的钓鱼城保卫战就发生在重庆地区。元朝统一后，为了加强对川东地区的统治，在重庆设置了重庆路总管府，并作为四川南道宣慰司所驻节之地，元朝中央政府也在重庆设置了税务机构，四川行省也一度迁往重庆。明代，重庆仍为西南军事重镇，设有重庆府和重庆卫，并设兵备道，管辖重庆府、卫和各州县以及贵州、酉阳等处土司，成为控制川东、贵州等地，监视少数民族的军政中心。清代，又在重庆加设分巡川东道署，加强对川东地区的控制。清初，四川总督也一度移驻重庆。

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重庆始终作为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重庆同时又是一个经济落后、功能单一的封建军事城邑，城市的工商业很不发达，这与重庆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有关。重庆多丘陵、山地而平坝较少，这一恶劣的地形特征使得重庆地区的广大山区腹地长期得不到开发，榛（zhēn 真）莽草莱遍地，地广人稀，与同时代“沃野千里，五谷丰登”的川西平原相比，犹如天壤之别。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要说远逊于川西平原，即使与川北的嘉陵江中游地区相比，也是望尘莫

及。经济上的落后带来文化上的荒漠，自隋唐到宋代以前，重庆地区一直是朝廷贬谪流放罪犯的场所。这一切都严重影响着重庆城市的发展，与川西平原的成都相比，重庆的城市化进程起步严重滞后。但是，老天并没有亏待巴渝儿女，它赐给了重庆一个无与伦比的瑰宝，那就是重庆得天独厚的为四川其他各地所不能及的地理优势——地处长江上游的水运要冲。

重庆地控川江（长江上游宜昌至宜宾段），向北通过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与川北的合川、南充、遂宁、广安等地和甘南、陕南发生联系，沿长江顺江而下，在涪陵接纳马江与黔北相连，上经江津接纳綦江，经泸州接纳沱江，经宜宾接纳岷江，与川东南的涪陵、黔江地区，川南的泸州、宜宾地区，川中的自贡、内江地区，川西的成都、雅安地区都发生了联系，沿金沙江（长江上游一段）下游直抵滇北，成为沟通四川盆地以及滇北、黔北、甘南、陕南的水运枢纽。同时，重庆又位于长江——这条中国商品流通主干道的上游，顺流而下，中经“九省通衢”的武汉，与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连接，沟通了横贯整个中国的经济大动脉，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各省与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商品贸易的起点。众所周

知，四川地处中国内陆，与全国主要经济区东障巴山，西屏邛崃，南踞苗山，北倚秦岭，仅长江一线与外相通。这种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却使得重庆这个位于长江上游的水运枢纽更加夺目耀眼，在近代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中唐以后，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日益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其政治中心也由偏西的长安、洛阳东移到开封、北京、临安一线，依靠大运河同经济重心相连接。长江成为四川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相联系的惟一生命线，而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便显得繁忙起来，一步步地由一个经济落后、功能单一的封建城邑转变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功能的城市。近代以降，由于上海经济的崛起，重庆以其自身商业和贸易上的独特地位紧跟上海，使重庆城市的发展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近代中国历史必定要创造出上海这一中国经济中心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历史也必然会为四川和内陆地区创造出另一个“上海”——重庆这一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承担起长江流域经济链条上东西结合的重要一环的历史责任。

## 2. 巴渝地区的开发

重庆，背靠“天府之国”，中连“鱼米之乡”，下接“金三角”，特殊的地理优势为这座古老山城日后的腾飞插上了坚实的翅膀。但是，重庆的水运优势地位并不能使重庆人坐享其成，地理上的优势能否化为经济上的优势，还取决于四川乃至长江上游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重庆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重庆，必须以长江上游经济的开发为依托，面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才能充分利用它的地理优势发展转口贸易。

由于历史的原因，重庆地区的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曾两度被打断而出现严重的倒退，从而使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三盛两衰”的曲折发展过程。

据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古代巴渝地区的先民——巴人就已生息劳动在今天的重庆地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之后，巴文化又以其别具一格的地方特色，为古代文化宝库增添了奇辉异彩。但是，战国以来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古代重庆地区的经济开发，无论其速度、规模，

还是效益都大大落后于川西的成都平原、川北的嘉陵江中游地区。从战国到东汉晚期，是巴渝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一个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水利得到兴修，铁制农具开始使用、推广，牛耕也已较为普遍，沿江河谷地带已开始普遍植桑养蚕，种植水稻和各种经济作物，部分浅丘陵区也陆续开垦，播种黍稷。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重庆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巴郡只设置了江州、垫江（今合川）、枳（今涪陵、长寿）等三县，区域开发呈点线式分布，广大山区内地依然是莽莽原野，荆棘满眼，点点畲田，星落稀疏。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逐鹿，重庆地区历经刘璋、蜀汉、魏、西晋、成汉、东晋、西魏各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川东一带居民大量流入荆湘，当地人口锐减，城邑空虚，村落萧条，江州古城，成了一座只有几百人家的荒残废城，战国秦汉以来经济开发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同时，原居住在黔北、川南山区的僚人大量涌入，为土著居民的数倍，以致许多地方完全成了僚人的世界。直到公元 552 年四川重新得到平定之后，汉人才重新生息或东来，人口逐渐增多，并不断迁徙进入僚区居住，使僚汉之间的交往大为

增加。僚人逐渐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在僚汉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地区重新开始了经济开发的历程。

隋唐 300 余年，重庆地区未经战乱，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区域开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突出的表现在广大丘陵地区开始得到开发，内地大量置县，到唐晚期，共计有巴（今重庆市）、江津、石镜（今合川）、铜梁等 24 县。宋代是巴渝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丘陵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梯田被开垦，水稻已广泛种植，在没有水利灌溉的丘陵和山区，已开始利用水塘、池堰等灌溉稻田，纺织、井盐、瓷器和冶金等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农业的进步和手工业的发展，使重庆地区的商业开始繁荣，重庆的地理优势也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四川东部的交通孔道和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宋代重庆城的转口贸易十分兴盛，城区一带“两江之商贩，舟楫旁午”，沿江地区逐渐发展为商业功能占有相当比例的商业区。这表明重庆城的功能正在变化，逐渐由一个高垒墙深的单一军政中心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发展的城市演变。

南宋末年，蒙古入侵中原，宋蒙对峙，重庆地区成为宋蒙交战的主战场，前后长达 40

余年。连年的征战使重庆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再度遭受极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和逃散，隋唐时期设置的州县大量被省并，重庆地区的经济开发进程再度中断。元统一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内部争斗，加上自然灾害频繁，终元一代，重庆经济未能有所发展。元末红巾军的一支在明玉珍的率领下攻入四川，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建大夏国，废除元代苛重徭役，采取措施恢复生产，才使重庆地区社会生产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被废弃的州县也渐次有所复置或新设。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傅友德分兵两路取蜀，夏政权覆亡，四川遂归于明朝统治。这个时期，重庆地区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到明代中期，重庆府的耕地与人口已占全省的1/3，重庆地区已成为四川粮食的主要产区之一。明万历年间四川的田粮额数，成都府31州县为157729石，重庆20州县及5土司则为344497石，重庆府已超过成都府达1倍以上。在《明史·食货志》记载的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30余个城市名单上，重庆已是榜上有名，成为中国的一个著名城市。

明末清初，四川又逢战乱，重庆地区的经

济开发再次受到沉重打击。重庆城虽为四川总督驻节之地，但“哀鸿稍集，亦不过数百家”，更遑论其他。清统一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少地的农民入川开垦荒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重庆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经济作物如蚕丝、苧麻、柑橘、桐油、甘蔗、竹木等产量也大量增加，井盐、矿冶、陶瓷、制茶、制糖等业也皆有发展，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商品经济的活跃带来商业的繁荣，这使重庆这个川江航运的枢纽焕发了盎然的生机。长距离贩运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通过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嘉陵江、沱江、岷江以及渠江、涪江、乌江、綦江、赤水河，使滇北、黔北及省内的主要粮、棉、糖、盐产区的外运商品得以汇流而下，集中重庆再转运长江中下游及其他地区。同时，通过长江交通主干道与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相联系，全国各地的商品沿长江溯流而上，汇集重庆再转运四川各地及滇北、黔北等地。如清代乾隆以来的“川米易苏布”就是通过重庆这个口岸开展贸易的。

乾隆初年，重庆城已是一个“商贾云集、百物萃聚”的商业性城市，“九门舟集如蚁”，

往来于重庆的各类船只不下 50 种，重庆城内的商业行帮已有 25 个，各业牙行也达 150 余家，经营着棉花、棉纱、土布、丝货、食盐、纸张、书籍、药材、山货等各类物资。广东、福建、浙江、湖广、江西、江南、山西、陕西等省商贾也经营往来于重庆与当地，并于乾隆年间陆续在重庆设立会馆，旨在保护各省间往来贩运的商贾和寄居外省人员的一般权益。民间驿传业也在重庆出现。清代重庆城市规模比明代有所扩大，府城内街巷达 240 余条，“酒楼茶舍与市闾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尤其是沿江一带商业性用房鳞次栉比，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工商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人口结构也有了较大变化。到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人口比例至少在某些街区已超过了官僚、地主、军队、僧尼等人口的比例。这一变化表明重庆城的经济功能已相当突出，初步改变了经济落后、功能单一的状况。到 1824 年，重庆府城的城市人口已达 65286 人，加上江北厅的人口，估计当在 8 万人左右，人口结构开始由以消费人口为主向非消费人口为主的方向发展。重庆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都会，并一跃赶上了川西的成都，与之并驾齐驱，是四川省内的双子座。

## 二 重庆开埠

### 1. 被迫开放

1840年，英国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历程。

四川僻处中国西南，碍于自然条件和交通的限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西方殖民列强的魔爪尚未能伸入到这一地区。但是，资本的扩张性和掠夺性决定了西方殖民列强不断追求扩大对华贸易，因此，重庆和四川的被迫开放只是个时间问题。

19世纪60年代末，英国对华贸易出现了不景气。这引起了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深深忧虑。一个英国商人哀叹：“商业是我们的生命源泉，是我们的生存气息，没有它，英国就会成为北海中最贫困、苦恼、人口过多的一个小

岛。”因此，开辟中国新的内地市场、扩大对华贸易就成了英国资产阶级政府迫在眉睫的课题。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部，物产富饶的四川成为英国殖民者垂涎三尺的猎物。而重庆地处川江枢纽，扼川东门户，又沿长江与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殖民城市上海相连，自然也就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四川、开辟西部市场的头一个猎取目标。

1875年初，一支由缅甸侵入中国云南边境的英国部队行至腾越地区，遭到当地边民的英勇阻击，当场击毙了专程由北京前往迎接的英国公使翻译官马嘉理，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开放重庆为通商口岸的一个良机。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了解决“滇案”的八点方案，要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在云南大理和滇省其他地方派驻领事，其中特别指明要求开放四川重庆作为通商口岸。在英国侵略者的军事恫吓下，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威妥玛在烟台就“滇案”问题举行谈判。1875年9月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商英商事宜。但同时李鸿章还想凭借三峡天险来阻止侵略者人

川，故在条约中规定：“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然而，这只能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而已。

1881年12月，英国驻重庆领事谢立三乘吃水0.91~1.2米的帆船安然渡过新滩（位于四川云阳县境内，是长江上游最浅险滩）后声称：“有什么理由会堵住一艘同样吃水，利用蒸汽作动力而又有特殊构造的轮船上驶呢？”他鼓励英国的冒险家把轮船开到川江，上驶重庆，以便迫使清政府履行开放重庆的承诺，使《烟台条约》由文字变成事实。自此以后，西方冒险家频频弄险三峡，窥测水道。一个叫立德乐的英国商人充当了入侵重庆的急先锋，他因此而被英国资产阶级誉为“西部中国的英国开路先锋”。1885年，立德乐正式向清政府申请宜昌——重庆间行轮执照，并组成川江轮船公司，还把他在英国特制的“固陵”号轮船驶抵宜昌待发。

英国商轮驶入川江，必然造成川江中国木船业的凋零衰败，因此，遭到了宜昌——重庆之间仰赖木船运输为生的百万人民的反对。一时间四川民情汹汹，清政府也对事情的发展始料不及，立刻指派李鸿章与英国政府交涉，企

图用 12 万两白银的高价买下立德乐的“固陵”号轮船及其在宜昌的码头等设施，以阻止英国商轮上驶重庆。但是，英国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妥协，答应开放重庆为通商口岸，条件是英国商轮 10 年内不得上驶重庆。1890 年 3 月 31 日，中英两国代表在北京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作为通商口岸；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经过 14 年的纠缠，英国侵略者终于实现了夺取重庆，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的梦想，而清政府换来的只不过是“英轮 10 年内不上驶川江”的一纸空文。

1890 年 11 月 4 日，重庆海关首任税务司英国人好博逊、英国驻重庆常任领事富尔富德以及伦敦布道团的达文波特同时抵达重庆，并于 1891 年 3 月 1 日正式设立了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重庆海关。不久，重庆海关在万县设分关，英国人阿斯克为首任代理税务司，至此，重庆海关控制了四川境内的全部川江。重庆海关的设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二十个通商口岸，从此揭开了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苦难篇章。

## 2. “ 华西的上海 ”

重庆开埠前夕，一个英国殖民者曾经这样展望过重庆的未来：“重庆开埠之后将成为华西的上海。”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最大侵略基地。在西方殖民者看来，重庆无疑是又一个上海——他们肆意蹂躏，任意践踏的场所、冒险家的乐园。重庆，这座饱经沧桑的中国西南名城就这样开始了它苦难的岁月，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城市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华西的上海”。

1890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不仅取得了在重庆开埠的权利，同时也取得了建立领事馆的法律依据。同年，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正式设立，首任领事为禄福礼。这是西方列强在重庆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之后，法国、美国、日本、德国相继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如果说驻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是清朝中央政府惟命是从的太上皇的话，那么各国驻渝领事馆对于重庆地方政府则更是颐指气使。1895年，日本政府挟（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将重庆府城朝天门外南岸的王家沱